
流动范围是否影响了家庭消费支出？

——基于农村流动人口数据的实证分析

宋明月 周博文 何伟¹

【摘要】：人口流动范围带来的地域差异对农村流动人口家庭消费具有显著影响。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有流动人口的农村家庭消费更高，省内流动的农村人口更具有身份认同感并且家庭消费高于跨省流动人口。在受教育程度较低、户主年龄为中年、非中等收入组和流入东部地区的家庭中，省内流动人口的家庭消费高于跨省流动人口的现象更加明显。据此，可通过引导农村流动人口本省就业、提升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和增强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归属感，进而提升农村流动人口家庭消费支出。

【关键词】：流动范围 农村流动人口 家庭消费支出 异质性

一、引言

我国长期存在居民消费需求不足问题。¹一方面，我国与世界平均消费水平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2018年，世界平均消费水平为人均6207美元，而中国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为3154美元（2010年不变价美元）。另一方面，分城乡来看，虽然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高于城镇，但绝对值不到城镇的一半。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使国内市场成为最终需求的主要来源”。因此，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意义重大，尤其在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及疫情之后，更应该依靠扩大内需发挥消费对国内大循环的拉动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深入实施，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从农业领域转移到非农领域。2021年，我国已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农村流动人口的生存与发展对于维系社会和谐稳定以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更加重大。2016-2019年，农村流动人口规模持续扩大；2020年，受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农村流动人口规模较上年缩减466万人，下降2.7%。³虽然规模有所减小，但农村流动人口规模仍占农民工总量的59.4%，且近五年一直维持在60%左右。农村人口流动的主要目的是寻求就业机会，进而提高家庭收入。因此，数量庞大的农村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潜力不容忽视。⁴关注农村流动人口，采取相应措施提升农村流动人口家庭消费水平，对于缩小城乡差距、缓解我国内需不足至关重要。

哪些因素会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呢？学者们大多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一是从劳动力流动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路径来展开分析。人口流动前后产生的收入差异为学者们进一步洞察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了视角。一些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会带来家庭收入的增加，但对于是否促进家庭消费支出却存在不同观点。如有学者认为家庭收入的增加会对家庭消费支出产生正向效应，⁵而尹志超等的研究发现，由于收入波动、失业、医疗、健康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收入未能对家庭消费产生显著影响。⁶二是以农村流动人口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为切入视角，分析流入地在医疗、养老等方面社会保障政策对农村流动人口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提高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保障参与率，加强对流动人口的保障程度，能够减少他们面临的不确定性进而促进其消费。⁷三是从农村流动人口自身的主观心理因素及其家庭特征进行分析。如对流入地的认同感、子女是否跟随、文化背景差异以及家庭流动规模等方面。⁸

¹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我国家庭异质性消费行为研究”（18CJL045）；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异质性消费者视角下山东省扩大内需的路径与有效制度构建”（ZR2021MG047）的阶段性成果

以上影响因素都一定程度上与人口流动范围带来的地域差异相关，但当前鲜有研究从这一视角来展开。随着交通和通信便利化程度日益提高，农村劳动力对流动范围有了更多的选择，依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技术文件，流动范围主要包括跨省流动、省内跨市、市内跨县三种情形。基于不同的约束条件，农村劳动力选择了不同的流动范围，其在流动过程中产生的成本以及在进入流入地之后面临的社会环境都有所不同。因此，本文从流动范围这一较为新颖的角度对农村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展开分析，试图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是否应鼓励农村人口流动？第二，若应鼓励人口流动，那么引导农村人口流动的方向是什么？第三，流动范围对农村流动人口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在不同组群中的表现是否相同？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回答，为促进农村人口城镇化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助于探索扩大内需的有效路径。

二、理论与假说

根据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假设农村家庭的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家庭的持久收入，当 t 期与 $t-1$ 期均没有流动人口时，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家庭消费支出约束方程可以表示为：

$$C_t = \beta Y_t^* = \beta [\sigma Y_t + (1-\sigma)Y_{t-1}] \quad (1)$$

其中， C_t 代表当期消费支出， β 为边际消费倾向，取值介于 0 与 1 之间， Y_{tp} 为当期持久收入水平，假设持久收入水平取决于两期， Y_t 为 t 期收入， σ 为加权数。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指出，工农业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别是促使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会带来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中有流动人口会对其当期收入产生正向冲击，同时，城镇居民家庭的“消费示范效应”会引致农村流动人口改变家庭原有的消费观念，从而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改善。⁹因此，假设家庭 $t-1$ 期无流动人口， t 期时有流动人口，那么 t 期的持久收入和当期消费可以表示为：

$$Y_t^* = \sigma Y_t \varepsilon_{yt} + (1-\sigma)Y_{t-1} \quad (2)$$

$$C_t = \beta Y_t^* + f(C_{t-1}, h_t) = \beta [\sigma Y_t \varepsilon_{yt} + (1-\sigma)Y_{t-1}] + f(C_{t-1}, h_t) \quad (3)$$

ε_{yt} 表示家庭有流动人口后 t 期收入所面临的正向冲击因子， h_t 表示 t 期流入地的消费习惯。¹⁰通过比较 (3) 式与 (1) 式可知， t 期有流动人口后，不仅家庭收入发生了变化，还会同时受到流入地消费观念及先前固有消费观念的影响，引致消费决策方程发生改变。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1。

假说 1: 其他条件相似时，有流动人口的农村家庭消费支出更高。

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也会对家庭消费支出产生影响。不可否认，一方面，流动范围越大，农村流动人口可供选择的就业机会就越多，更有可能获取较高的工资收入。但随着流动范围的扩大，农村流动人口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相较本地居民，农村流动人口受到户籍和空间限制，可能无法享受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性政策，面临着更高的不确定性。在医疗方面，农村流动人口难以被当地居民医疗保险覆盖，异地就医可能带来额外的支出；在教育方面，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往往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才能享受与当地居民子女同等的教育资源。¹¹另一方面，随着流动范围扩大，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的生活背景差异就越大，这可能使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缺乏归属感，从而难以被示范效应同化。同时，随着流动范围扩大，农村流动人口面临的住房、交通及返乡成本也会增加。针对流动范围较大的家庭，我们对 (3) 式做出如下修正：

$$C_t = \beta Y_t^* \varepsilon_{yt} + f(C_{t-1}, h_t) - g(\mu_t) = \beta [\sigma Y_t \varepsilon_{yt} + (1-\sigma)Y_{t-1}] + f(C_{t-1}, h_t) - g(\mu_t) \quad (4)$$

μ 为不确定性水平的强度, $g(\mu_t)$ 表示较大范围流动人口家庭在 t 期面临的包括医疗、教育、住房和交通等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消费抑制。通常来讲, 流动范围越大, 家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强度也会更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2。

假说 2: 较小流动范围的农村流动人口家庭消费支出更高。

综上所述, 相比无流动人口的农村家庭, 有流动人口的农村家庭消费支出可能会更高。但在流动人口家庭中, 流动范围较小的家庭消费支出可能更高。

三、变量与模型

(一)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村流动人口家庭消费支出, 用家庭平均每月消费支出的对数来表示。这里的家庭平均每月消费支出指所有家庭成员与日常生活消费相关的支出。

2. 核心解释变量:

受访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首先, 分析农村流动人口是否跨省流动对于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 “1” 代表跨省流动, “0” 代表省内流动; 其次, 使用省内流动样本进一步分析省内是否跨市流动对于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 “1” 代表省内跨市流动, “0” 代表未跨市流动(市内跨县流动)。

3. 控制变量。

本文对一系列既可能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家庭消费支出又可能影响流动范围的变量, 包括受访者(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个人特征, 家庭收入对数、家庭规模、现住房性质等家庭特征变量以及人际交往、户口迁移意愿等社会融合特征变量进行了控制, 同时还对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入地省份进行了控制。其中, 从全样本看, 性别均值为 0.583, 说明农村劳动力流动以男性为主, 但男女比例并不悬殊。进一步从不同流动范围来看, 跨省流动中男性劳动力流动群体占比较大, 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选择较广范围的流动; 从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来看, 农村流动人口以青年群体、中学学历、已婚人群为主; 从现住房性质来看, 在流入地购买住房的农村劳动力群体非常稀少。但从样本看, 相较于跨省的农村流动人口来说, 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的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有更强的购房意愿, 这可能是由于小范围流动的农村人口在流入地有更为接近的生活背景和更强的归属感; 人际交往均值表明, 流动范围越小则人际交往越活跃; 户口迁移意愿的均值仅为 0.274, 即大部分农村流动人口并不愿意将户口迁入流入地。

指标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说明	总样本		市内跨县		省内跨市		跨省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家庭消费支出	家庭平均每月消费支出(对数)	7.96	0.579	7.895	0.555	7.963	0.571	7.976	0.589

性别	女=0;男=1	0.583	0.493	0.577	0.494	0.571	0.495	0.590	0.492
年龄	受访者年龄	36.932	9.769	36.93	9.713	36.54	9.628	37.127	9.847
民族	受访者民族,汉族为1,其余为0	0.904	0.295	0.864	0.343	0.874	0.332	0.929	0.256
受教育程度	未上学、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分别赋值1~5	3.074	0.866	3.118	0.855	3.163	0.911	3.019	0.842
婚姻状况	未婚=0;已婚=1	0.848	0.359	0.835	0.372	0.824	0.381	0.864	0.343
家庭总收入	家庭平均每月总收入(对数)	8.645	0.536	8.47	0.512	8.582	0.526	8.721	0.531
家庭规模	家庭同住人口数	3.213	1.18	3.157	1.165	3.145	1.200	3.262	1.172
现住房性质	非自有=0;自有=1	0.062	0.241	0.105	0.307	0.080	0.272	0.041	0.199
人际交往	与非本地人交往多=0;与本地人交往多=1	0.257	0.437	0.400	0.490	0.311	0.463	0.193	0.394
户口迁移意愿	不愿意=0;愿意=1	0.274	0.446	0.201	0.401	0.269	0.444	0.295	0.456
样本数		55268		8160		15646		31462	

注：根据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统计得到。

(二)模型设定

流动人口无论是在个人特征、家庭特征还是社会融合特征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其对于流动范围的选择通常并不是随机的，流动范围对于农村流动人口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可能是自选择的结果，因此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来降低选择性偏差。基本思路为：首先，在一组可观测协变量 X_i 给定的情况下，预测个体 i 进入到处理组的概率，公式为：

$$P(X_i) = P_i(D_i = 1 | X_i) \quad (5)$$

其中， $P(X_i)$ 表示农村流动人口跨省流动或省内流动、省内跨市流动或市内跨县流动的概率。 D_i 表示赋值为0或1的指示变量， X_i 表示影响流动范围选择的变量， i 表示第 i 个样本。

其次，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值对样本进行匹配。最后，计算平均处理效应(ATT)，具体计算公式为：

$$\begin{aligned} ATT &= E(C_{1i} - C_{0i} | D_i = 1) \\ &= E\{E(C_{1i} - C_{0i} | D_i = 1, P(X_i))\} \\ &= E\{E(C_{1i} | D_i = 1, P(X_i))\} - E\{E(C_{0i} | D_i = 1, P(X_i))\} \end{aligned} \quad (6)$$

其中， C_{1i} 表示农村流动人口跨省流动或跨市流动的家庭消费， C_{0i} 表示农村流动人口省内跨市流动或市内跨县流动的家庭消费， E 表示期望值。¹²

(三)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微观数据包括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CHFS2017) 和 2017 年国家卫健委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CMDS2017)。剔除家庭成员户口性质为非农业、农转居、居民的样本, 流动原因为投靠亲友、搬迁搬家、家属随迁等的样本以及异常值和缺失值, 最终得到 55268 个样本数据。

四、实证结果

(一)人口流动对家庭消费支出影响的 PSM 检验

由于检验需要没有流动人口的家庭样本作为控制组, 我们将 CHFS2017 样本分为两类, 即有流动人口的家庭和无流动人口的家庭(称之为处理组和控制组)。对样本进行初步统计后发现, 有流动人口家庭的月收入均值为 6433 元, 月消费支出均值为 4392 元; 而没有流动人口的家庭月收入均值只有 3682 元, 月消费支出均值为 2924 元, 有流动人口的家庭收入与支出均显著偏高。为避免选择性偏差, 本文进一步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PSM) 过滤与处理组家庭有相似可观测特征的控制组家庭, 使两组之间具有可比性。具体来讲, 使用户主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 家庭收入对数、家庭的房屋类别以及家庭规模等作为协变量进行匹配。同时根据数据特点, 借鉴宋明月和臧旭恒的分类方法,¹³ 本文进一步将家庭消费支出分为生存型消费支出与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支出。其中, 生存型消费支出包括衣食住行四个方面, 教育培训支出、医保外医疗支出、保健支出、旅游支出等其他支出则被归类为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支出。由于外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通常面临住房支出, 因此还需要分析是否有流动人口对去掉住房相关支出后的消费支出的影响。

为了稳健, 本文选择一对一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三种方法进行检验, 所得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家庭中是否有流动人口与家庭消费支出的 PSM 检验结果

	家庭消费支出	生存型消费支出	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支出	去掉住房相关支出后的消费支出	样本数	
	(1)	(2)	(3)	(4)	处理组	控制组
一对一匹配	0.119*** (0.026)	0.154*** (0.033)	0.154* (0.083)	0.111*** (0.025)	3151	7384
半径匹配	0.137*** (0.019)	0.157*** (0.025)	0.148** (0.063)	0.128*** (0.019)	3151	7384
核匹配	0.139*** (0.019)	0.160*** (0.025)	0.152** (0.063)	0.130*** (0.019)	3151	7384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 *, **,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从表 2 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三种方法的估计值非常接近, 家庭中是否有流动人口对四种类型消费支出的平均处理效应 (ATT) 均显著为正, 即有流动人口的农村家庭消费支出要高于没有流动人口的家庭。以第 (1) 列为例, 若 ATT 取平均值 0.13, 则表明在其他条件相似时, 有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支出比没有流动人口的家庭高出约 14%。第 (4) 列和第 (1) 列相比, 系数有所变小, 说明有流动人口对家庭消费支出的提升作用一部分来自住房相关支出的增加。有流动人口对家庭各项消费支出的提升作用, 主要源于流动人口外出就业会带来家庭收入的增加, 家庭中未流动人员和流动人员分别在两地生活, 会增加家庭与衣食住行相关的支出即生存型消费支出, 也更容易受到现代化消费观念的影响,¹⁴ 从而有利于家庭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支出的增加。因此就扩大内需来讲, 有必要引导及鼓励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

(二)流动范围对农村流动人口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

为进一步分析农村人口流动方向的作用，我们先将所有样本按照是否跨省分为两组，再将省内流动样本按是否跨市分为两组，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对流动范围与农村流动人口家庭消费支出间的关系分别展开分析。选取的协变量包括受访者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社会融合特征以及省份虚拟变量。平衡性检验发现，匹配后绝大多数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小于 10%且不存在显著差异。

1. 不同流动范围对农村流动人口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

表 3 汇报了流动范围是否跨省以及省内是否跨市流动对于农村流动人口家庭消费支出影响的结果。¹⁵可以看出，流动范围是否跨省对于家庭消费支出和去掉住房后消费支出的平均处理效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相较跨省流动，省内流动家庭的消费支出更高一些；但是家庭消费支出的系数要小于去掉住房支出后的消费支出的系数，即住房支出在跨省农村流动人口的支出中占据一定比重。而流动范围是否跨市对于家庭消费支出以及去掉住房后的消费支出均无显著影响。

表 3 不同流动范围与农村流动人口家庭消费支出的 PSM 检验结果

	家庭消费支出	去掉住房支出后的消费支出	样本数	
			处理组	控制组
流动范围是否跨省	-0.106*** (0.011)	-0.133*** (0.016)	25983	23806
省内是否跨市	0.002 (0.013)	0.035 (0.021)	14467	8160

为何省内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支出要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从人口流动规律来看，相对于省内流动的人口，跨省流动劳动力的流出地往往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属于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或较发达地区的流动。虽然在流入地的收入水平有所上升，但受到低消费水平的惯性影响，他们的支出水平难以得到较大提升。从农村流动人口来看，一是返乡及日常生活的成本通常与流动范围大小紧密相关，省内流动人口的生活成本更低，对其消费的挤出效应更小，因而消费支出更高。二是跨省流动会使农村人口举家搬迁的可能性变小，在外省务工的农村劳动力需要定期给家中老幼汇款，挤压了一部分消费支出；三是流动范围越小，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的生活习惯、文化习俗等方面相差就会越小，流动人口自身的消费习惯更容易融入当地，从而提升消费支出。

2. 不同流动范围与家庭消费支出的内生性讨论及处理效应检验

流动范围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因为，消费支出较低的农村家庭，其收入一般也处于较低水平，家庭成员通常会为了寻求更多的就业机会而选择范围更大的流动。此外，还可能同时影响流动范围和流动人口家庭消费支出的遗漏变量，从而引起内生性偏差。

为了克服上述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受访农村流动人口的首次流动范围作为本次流动范围的工具变量。通常来讲，农村流动人口对于流动范围的选择，往往会基于自己以往的经验做出相应的判断。首次流动为跨省的农村流动人口面临着更高的成本，因此再次选择流动范围时，可能会倾向于减小流动范围。而省内流动人口的流动成本相对较小且生活背景等方面与其流出地更为相似，跨市流动通常会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更高的收入，因此再次选择流动范围时他们也会倾向于省内流动。但受访者的首次流动范围对其现阶段的家庭消费支出而言却是外生的，因此选择受访者的首次流动范围作为本次流动范围的工具变量具有一定的可

行性。使用处理效应模型的最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估计，结果见表 4。从结果看，工具变量的选择较为理想，流动范围为省内流动的家庭消费支出显著高于跨省流动的家庭，省内跨市流动对于家庭消费支出并无显著影响，这与表 2 的结论是相同的，说明上述 PSM 检验的结果是可靠的。

表 4 不同流动范围与家庭消费支出的处理效应检验

因变量：家庭消费支出		流动人口总样本	省内流动样本
处理效应估计结果	流动范围是否跨省	-0.054*** (0.010)	
	省内是否跨市		-0.020 (0.081)
	似然比检验 P 值	0.950	0.778
一阶段 Probit 估计结果	首次流动范围	-1.979*** (0.026)	0.103*** (0.021)
样本数		55268	23806

由于对省内流动的样本来说，区分是否跨市流动对农村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支出并未发现显著差异，因此在接下来的实证部分，为了进一步得出更加丰富的结论，本文仍然基于流动人口总样本，聚焦“是否跨省流动”的相关问题。

3. 异质性分析

(1) 流动范围是否跨省对不同年龄农村流动人口家庭消费支出影响的异质性。按照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划分标准，44 岁以下为青年，45 岁至 59 岁为中年人，60 岁以上为老年人。据此将流动人口划分为三个群体，PSM 检验结果由表 5 所示。对于 59 岁及以下的中年群体和青年群体来说，平均处理效应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且中年群体的系数要大于青年群体；而对于老年农村流动人口来说，流动范围对其家庭消费支出并无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对于青年群体来说，他们思想开放，能够较快接受新鲜事物，更易接受现代化的消费观念，用于娱乐及消遣等享受型的消费支出比较多，¹⁶ 受流动范围的影响要小于中年群体；而中年群体家庭负担较重，受流动范围的影响更大。

表 5 流动范围是否跨省与不同年龄家庭消费支出的 PSM 检验结果

因变量：家庭消费支出	一对一匹配	半径匹配	核匹配	样本数	
				处理组	控制组
44 岁及以下	-0.096*** (0.012)	-0.100*** (0.009)	-0.105*** (0.009)	19091	18363
45~59 岁	-0.115*** (0.021)	-0.121*** (0.016)	-0.123*** (0.017)	6563	5085
60 岁及以上	-0.033 (0.083)	-0.024 (0.070)	-0.039 (0.015)	329	353

(2) 流动范围是否跨省对不同受教育程度农村流动人口家庭消费支出影响的异质性。根据表 1 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农村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初中学历上。因此，以此作为分界点，将全体农村流动人口分为初中学历及以下和初中学历以上两个群体，实证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两个群体的平均处理效应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但学历在初中以上的样本系数明显更

小。这可能是由于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程度也会越低。样本统计显示，初中及以下的农村流动人口家庭平均月收入为 6386 元，初中以上的则为 7239 元。同时，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更容易接受先进的消费观念，从而家庭消费支出受流动范围的弱化影响更小。

表 6 流动范围是否跨省与不同受教育程度家庭消费支出的 PSM 检验结果

因变量：家庭消费支出	一对一匹配	半径匹配	核匹配	样本数	
				处理组	控制组
初中及以下	-0.108*** (0.013)	-0.102*** (0.009)	-0.105*** (0.010)	20457	16919
初中以上	-0.083*** (0.019)	-0.088*** (0.015)	-0.088*** (0.015)	5526	6887

(3) 流动范围是否跨省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村流动人口家庭消费支出影响的异质性。借鉴何兴强和杨锐锋的做法，¹⁷ 所有样本以家庭月平均总收入排序后的 25% 和 75% 处为临界值，从而划分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PSM 检验结果(见表 7)显示，流动范围是否跨省对三种类型家庭消费支出的平均处理效应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但与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相比，这种差异在中等收入家庭中表现得最不明显。中等收入水平农村流动人口家庭住房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最少，即住房支出对其他消费支出的挤出效应最小，因而受流动范围的影响最小。统计样本发现，高收入群体中选择跨省流动的占比最大，跨省流动在带来高收入的同时也带来了更高的流动成本，因而高收入水平组的平均处理效应最大。

表 7 流动范围是否跨省与不同收入水平家庭消费支出的 PSM 检验结果

因变量：家庭消费支出	一对一匹配	半径匹配	核匹配	样本数	
				处理组	控制组
低收入	-0.068*** (0.017)	-0.089*** (0.013)	-0.087*** (0.013)	5395	7477
中收入	-0.054*** (0.012)	-0.069*** (0.009)	-0.070*** (0.009)	13146	11471
高收入	-0.105*** (0.018)	-0.112*** (0.014)	-0.111*** (0.014)	7443	4858

(4) 流入不同区域的农村流动人口家庭消费支出的异质性。首先，将受访者的现居住省份视为流入地，分析流动范围是否跨省对流入东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流动人口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¹⁸ 其次，以跨省流动样本为研究对象，按流动方向分为是否流入较发达地区两组样本，以农村流动人口户籍地省份，从西部流向东部、西部流向中部以及中部流向东部的农村流动人口为处理组，即流向较发达地区的样本，记为“1”；剩余流向发达程度相近和流向欠发达地区的样本为控制组，记为“0”。由表 8 可知，跨省流动对流入东部和中部的农村流动人口的家庭消费支出平均处理效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且东部地区大于中部地区。跨省流动对于流入西部地区的农村流动人口家庭消费支出并无显著影响。主要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物价水平和消费水平较高，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越大，越可能超出其以往的消费能力。在跨省样本中，流入较发达地区群体的平均处理效应显著为负，是否流入发达地区对减去住房支出后的家庭消费支出并无显著影响，这说明流入发达地区对消费支出的弱化影响主要来源于住房支出。¹⁹

表 8 流入不同流动区域下家庭消费支出异质性的 PSM 检验结果

因变量：家庭消费支出	一对一匹配	半径匹配	核匹配	样本数	
				处理组	控制组
流入东部地区	-0.118*** (0.019)	-0.129*** (0.013)	-0.128*** (0.013)	13700	5201
流入中部地区	-0.048*** (0.019)	-0.037*** (0.014)	-0.037*** (0.014)	2808	8114
流入西部地区	-0.016 (0.024)	-0.024 (0.017)	-0.030 (0.018)	9475	10491
跨省样本是否流入较发达地区	-0.065*** (0.024)	-0.089*** (0.016)	-0.087*** (0.016)	16437	5550

4. 机制分析

理论上，更认同本地城市身份的流动群体消费更高。²⁰关于省内流动的农村家庭消费支出更高的结论，可能的原因在于省内流动的人口与流入地的生活背景和消费习惯更为相似，身份认同感更强，从而消费支出更高。本文根据“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问卷”中“是否同意本地人愿意接受自己成为本地人的一员”、“是否同意自己已经是本地人”、“是否同意自己愿意融入本地人”三个问题，分别定义为身份认同1、身份认同2、身份认同3，并将完全同意和基本同意定义为1，完全不同意和不同意定义为0，以此作为被解释变量，对流动范围与身份认同进行PSM检验，结果见表9。可以看出，省内流动的农村流动人口，其本地人身份认同感相对更强，更容易融入流入地的生活中，其家庭消费支出高于跨省流动群体。

表9 机制分析结果

因变量：流动范围	一对一匹配	半径匹配	核匹配	样本数	
				处理组	控制组
身份认同1	-0.027*** (0.005)	-0.027*** (0.004)	-0.026*** (0.004)	25983	23806
身份认同2	-0.066*** (0.008)	-0.071*** (0.006)	-0.071*** (0.006)	25983	23806
身份认同3	-0.034*** (0.005)	-0.033*** (0.004)	-0.033*** (0.004)	25983	23806

5. 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结论的稳健性，从以下三个方面使用PSM进行检验：(1)将数据更换为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2)对农村流动人口家庭消费支出进行上下5%的截尾处理；(3)将数据中受访者的个人特征变量用家庭所有成员个人特征变量的平均值代替。PSM检验结果见表10，结果显示上述三种方法的估计结果的平均处理效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即省内流动人口的家庭消费支出更高一些。这与前文结论一致，说明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10 稳健性检验结果

因变量：家庭消费支出	一对一匹配	半径匹配	核匹配	样本数
------------	-------	------	-----	-----

				处理组	控制组
使用 2016 年数据	-0.071*** (0.007)	-0.072*** (0.006)	-0.070*** (0.006)	23511	24628
上下 5%截尾	-0.068*** (0.009)	-0.073*** (0.008)	-0.074*** (0.007)	24082	22340
更换受访者个人特征变量	-0.115*** (0.011)	-0.100*** (0.008)	-0.103*** (0.008)	25983	23806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重点研究了流动范围对农村流动人口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首先，基于 CHFS2017 数据，倾向得分匹配检验表明，农村流动人口家庭消费支出显著高于没有流动人口的家庭。这说明正确引导农村人口的流动，可以有效释放农村消费潜力。其次，基于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省内流动人口家庭消费支出高于跨省流动人口。再次，对省内流动人口群体展开进一步研究发现，是否跨市流动对家庭消费支出无显著影响。异质性研究发现，省内流动人口家庭消费高于跨省流动这一现象在受教育程度较低、户主年龄为中年、非中等收入组、流入东部地区的家庭中更明显。机制检验发现省内流动的农村人口更具有身份认同感。

因此，为提升农村流动人口消费水平，应顺应农村劳动力省内就业不断提高的趋势，继续引导剩余劳动力在省内就业。第一，对于农村劳动力外流严重的省份而言，应加快本地区产业发展，为本地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政府应加强对就业创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吸引外出流动人口返乡就业与创业。第二，地方政府应鼓励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人口继续接受相关教育及劳动技能培训，²¹提升农村流动人口的素质以及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增加其就业机会和就业的稳定性，减少农村流动人口收入不确定性。第三，住房支出在流动人口的消费支出中占据很大比重，为促进农村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政府部门应更大限度地提供公共租赁住房，为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发放住房补贴，放宽外来流动人口在本地购房的限制。²²这既能丰富流动人口家庭资产配置，也能增加外来人口的本地认同感。第四，促进农村流动人口融入城市。流入地政府可以加大外来流动人口的落户力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村流动人口市民化。同时也要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村流动人口的覆盖范围，²³如对子女随迁的农村流动人口家庭，要保障其子女可以享受同等的基础教育，增强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归属感，进而提升其消费水平。²⁴

注释：

1 宋艳姣、王丰龙：《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 2014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财经论丛》2020 年第 2 期。谭江蓉、杨彦彦：《人口流动、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人口学刊》2012 年第 6 期。

2 据《2020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 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6-2020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2016-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计算。

4 明娟、曾湘泉：《农民工家庭与城镇住户消费行为差异分析——来自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的证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 年第 4 期。

5 A. G. Wilson, "A Family of Spatial Interaction Models, and Associated Development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Vol. 3, No. 1, 1971, pp. 1-32. R. W. Jackson, G. J. D. Hewings, "Structural Change in a Regional Economy: An Entropy Decomposition Approach,"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Pittsburgh Conference, ISA, 1984*, pp. 451-455. A. De Brauw, S. Rozelle, "Migration and Household Investment in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19, No. 2, 2008, pp. 320-335. 蒲艳萍:《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西部 289 个自然村的调查》,《财经科学》2010 年第 12 期。

6 尹志超、刘泰星、张诚:《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中国工业经济》2020 年第 1 期。

7 张华初、刘胜蓝:《失业风险对流动人口消费的影响》,《经济评论》2015 年第 2 期。宋月萍、宋正亮:《医疗保险对流动人口消费的促进作用及其机制》,《人口与经济》2018 年第 3 期。曲玥、都阳、贾朋:《城市本地家庭和农村流动家庭的消费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对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9 年第 8 期。

8 孙文凯、李晓迪、王乙杰:《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地消费的影响》,《南方经济》2019 年第 11 期。王璟琳:《子女随迁对流动人口家庭务工消费的影响》,《劳动经济研究》2015 年第 6 期。J. Davis, D. Lopez-Carr, “The Effects of Migrant Remittances on Population-Environment Dynamics in Migrant Origin Area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ertility, and Consumption in Highland Guatemala,”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Vol. 32, No. 2-3, 2010, pp. 216-237. 杨永贵、邓江年:《家庭化流动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影响效应研究》,《现代经济探讨》2017 年第 9 期。

9 刘莉君:《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消费》,《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 期。

10 臧旭恒、陈浩、宋明月:《习惯形成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机制研究》,《南方经济》2020 年第 1 期。

11 王乙杰、孙文凯:《户口改变对流动人口家庭消费的影响——来自微观追踪数据的证据》,《劳动经济研究》2020 年第 2 期。

12 文乐、李琴、周志鹏:《商业医疗保险能提高农民工消费吗——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分析》,《保险研究》2019 年第 5 期。

13 宋明月、臧旭恒:《异质性消费者、家庭债务与消费支出》,《经济学动态》2020 年第 6 期。

14 李亮、付婷婷:《收入、消费观念与农村迁移人口消费》,《消费经济》2016 年第 1 期。

15 本文分别进行了一对一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限于篇幅,此处只给出了一对一匹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16 谭苏华、朱宇、林李月、杨中燕:《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人口与发展》2015 年第 1 期。

17 何兴强、杨锐锋:《房价收入比与家庭消费——基于房产财富效应的视角》,《经济研究》2019 年第 12 期。

18 东部地区省份包括北京、福建、广东、海南、河北、江苏、辽宁、山东、上海、天津、浙江,中部地区省份包括安徽、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吉林、江西、山西,西部地区省份包括甘肃、内蒙古、广西、贵州、宁夏、青海、陕西、四川、西藏、新疆(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云南、重庆。

19 本文对跨省样本是否流入发达地区与去掉住房支出后的消费支出分别进行了一对一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限于篇幅,并未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20 孙文凯、李晓迪、王乙杰：《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地消费的影响》，《南方经济》2019 年第 11 期。

21 景光正、盛斌：《我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多维度实证研究》，《城市问题》2020 年第 6 期。

22 何兴强、杨锐锋：《房价收入比与家庭消费——基于房产财富效应的视角》，《经济研究》2019 年第 12 期。

23 宁光杰、李瑞：《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工流动范围与市民化差异》，《中国人口科学》2016 年第 4 期。

24 何伟：《经济发展、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农民工分化》，《经济学动态》2021 年第 3 期。